

## 从荒村野渡到中原名镇

——历史的机遇成就了周家口

□ 王爱民

周家口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荒村野渡一举成为中原一大商埠、河南四大名镇之一,主要得益于元末贾鲁河的疏通,得益于明初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,使这里成为沟通河南与江淮的漕运水道。

京杭大运河一向为历代漕运要道,途经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北四省及天津、北京两市,成为沟通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,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,对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曾起到重大作用。元代统治的80多年里,黄河水患极为频繁,受灾最重的是河南和山东。元顺帝至正年间,黄河屡次在河南开封、山东曹州等地决口,河道北移。山东境内的京杭大运河遭到淤塞,影响漕运。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,大运河的漕运并未引起重视。明代建文四年(1402年),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攻陷南京,夺得皇位,

改年号为永乐。因朱棣大半生一直在北方,所以当上皇帝以后,决定迁都北京。从永乐四年(1406年)开始营建皇城,到永乐十八年(1420年)紫禁城基本完工,在这14年时间,每年征调民工十几万人,加上北京驻军,南粮北调成为朱棣头痛的一件大事。如何开辟一条便捷的水运新通道,便成了当务之急。到了永乐六年(1408年),朱棣采纳户部尚书郁新之谏,明令开辟中原漕运新通道。这条新的水运通道,为周口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。这段历史在《明史》、《大明会典》、《明太宗实录》上都有详细记载。《明史·食货三》载:“永乐元年,纳户部尚书郁新之言,始用淮船,受三百石以上者,道淮及沙河,抵陈州颍岐口跌坡,别以巨舟入黄河,抵八柳树,车运赴卫河,输入北平,与海运相参。”《大明会典》卷二十七

会计三漕运载:“国朝自永乐定都于北,军国之需,皆仰给东南……永乐元年,令于淮安用船可载三百石以上者,运粮入淮河、沙河,至陈州颍岐口跌坡下,用浅船可载二百石以上者,运至跌坡上。别以大船载入黄河,至八柳树(今河南南阳武县)诸处,令河南车夫陆运入卫河,转输北京。”从郁新的奏议中可知,在这条淮颍贾鲁河运线上,江南的漕粮若由南京装船,则先入长江,后进运河,在淮安以西经洪泽湖、湖淮河而上至正阳关,经正阳关后,再溯沙颍河向北至周家口,后再溯贾鲁河北上,至黄河南岸的郑州阳武、原武(二者今合为原阳县)、河阴一带之后,再溯过黄河转入卫河,即可经临清、天津,最终到达北京的通州皇家粮库。

## 周家口历史文化追溯之二

## 元代·白釉高足杯

【藏品档案】

元代白釉高足杯,通高8.6厘米,口径7.8厘米,足径5.8厘米。该杯为上下两节烧制,卷唇口,喇叭形高圈足。上部通体施白釉,下部裸胎,胎色泛铁红色,中间结合部有很漂亮的流釉痕,釉色温润、肥厚,玻璃质感较强,实为难得的元代文物藏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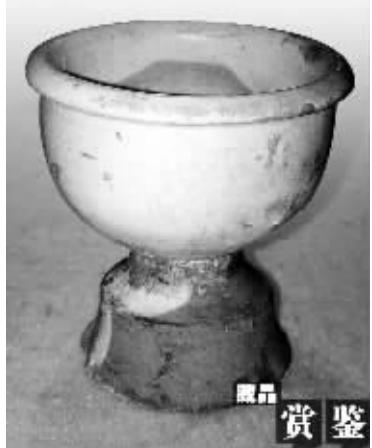
【藏品资料】

高足杯因杯下承以高足,若把柄,故俗称“把杯”。因执于手中便于在马上饮酒,又名“马上杯”。用手拂前供奉者,称“净水碗”。高足杯有陶、瓷之分。周市文物商店存藏最早的有战国灰陶高柄壶三件。而陶质高足杯尤以龙山文化黑陶高足杯最为著名。瓷质高足杯见于隋、唐,源于同时期的金银器,明显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,后成为元、明、清时期流行的器形。全国各个窑口都能生产。

高足杯及高足碗至目前,仍没有确切的产生时间。陈德富《古陶瓷收藏与鉴赏》说:“高足碗是蒙古族文化影响的一种极具时代特征的陶瓷器,元以前是见不到的。明、清时期则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传统而被继承、延续下来。”王莉英《陶瓷器鉴赏与收藏》说:“文献记载五代有高足碗。实际上五代时并无高足碗,有在碗心里印‘高足碗’三字者,但足很低。元瓷多见高足碗。”上述两本书里明确说元代以前的陶瓷中没有该器形。可是铁源主编的《古代民窑陶瓷》则以实物彩图分别列出了唐、宋、金时期高足杯(碗)的存在。

而清代朱瑛《陶说》卷六《说器中·唐器》之“高足碗(原注:十国南平器)”条记:“周羽冲《三楚新录》:高从晦时,荆南瓷器皆高足,公私竟置之,谓之高足碗。”不过,熟悉唐宋瓷器的同行们应该都知道,《三楚新录》文中的“高足碗”,并不是元明时期常见的那种高足杯,而是类似北宋青白瓷中常见的高圈足碗,这种碗的圈足通常高1厘米以上,有的高达1.8厘米左右,相对于唐、五代十国时期常见的矮圈足碗和玉璧碗底,这种高圈足碗确实可以称为“高足碗”了。此外,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宋代瓷柜窗里展出的影青釉高足杯却很醒目。陶瓷高足杯和碗在唐、宋时期已有制作并有存世。有藏友就收集到六朝时期青瓷高足杯。依据这些实物资料,似可把陶瓷高足杯的产生时代推进到公元六世纪前后。

毛琦/文



藏品图片由周口市文物商店提供



## 豫剧有个肖秀莲

□ 韩枫

1965年末的一个夜晚,贫瘠的豫东平原寒风凛冽,连横亘东西的大沙河也铺上了薄薄的冰镜。在距沙河南岸不远的一处简陋民居里,一阵爽脆如银铃的哭啼声划破了无生气的夜幕,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婴向世界宣告:我来了!

女婴的父亲姓赵,母亲姓肖,均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戏曲艺人。母亲听着女儿的哭声说:“小嗓门咋恁亮啊?咱家别再出唱戏的了,那份罪你受不了。”父亲盯着女儿的眉眼说:“唱戏就唱戏,闺女长得像你,漂亮,说不准能成个角儿呢!”丈夫无意说出的这句话,给初为人母的妻子心头罩上了一层阴影。憨厚的丈夫眼见妻子的面色由晴转阴,着实后悔不该这时候道出扫兴之言,就赶紧讨好妻子:“要不闺女随你的姓?你出身好,闺女随你,将来就不受罪了。”父亲的一个提议,女婴便有了一个相伴终生的名字:肖秀莲。

许多年后,肖秀莲成了河南豫剧界光彩耀目的明星中的一颗,她的名字在豫东大地家喻户晓。父母眼见女儿果然成了“角儿”,至今还时常以当年的那个提议说笑。母亲说,女儿是沾了“肖”姓的光而吉祥笼罩;父亲说,即使如此也是自己有超前远瞻之结果。说归说,笑归笑,这对已经步入暮年的老人心里清楚,他们的宝贝女儿是脚踩着荆棘和泥泞,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……

幼年的秀莲,是一朵浸泡着凄风冷雨的苦莲。她最喜欢的事,是跟着广播匣子唱戏或者与小伙伴跑四邻八村寻找剧团看演出。小姑娘天性聪颖,看过的戏过目不忘,模仿性也极强,当着父母和父老乡亲的面“显摆”学来的唱段一本正经毫不羞怯。她那天生的好嗓子经过父母有意无意的点拨,也变得韵味十足、板眼有致。父亲说:“闺女没投错胎,是个唱戏的料。”

秀莲11岁那年,背着简单的行李,带着父母的千叮万嘱,正式踏进了戏校大门。秀莲在戏校一上就是8年,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,秀莲从一个本能爱戏的小姑娘,成长为一名熟知戏曲理论、唱念做表俱佳的戏校拔尖生,人也变得愈加俏丽。毕业后,她被分配到周口地区豫剧团,正式圆了她那个此生要做演员的梦想,一朵戏曲舞台上的奇葩开始绽放。

几年过后,秀莲成了当时剧团女演员中最为出色的“五朵金花”之一,由她主演的剧目也能写出来一大串了,诸如《白蛇传》、《红珠女》、《狸猫换太子》、《皇宫恨》、《洛阳令》、《青鬼恨》、《红灯记》、《黑娃还妻》、《骨肉恩仇》、《小红袍》、《王

宝刀》、《西湖公主》等等。1996年,剧团排演现代戏《市井人生》参加河南省第六届戏剧大赛,肖秀莲没有竞争到一号女主角的位置,只能饰演大白桃这个二号角色。她毫不气馁,把平生第一次参赛当做从艺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跨越,经过不懈努力,她人目三分地塑造了一个都市粗俗女的人物形象,一举荣获省戏剧大赛、全国梆子会演以及中国豫剧节三个表演一等奖。作为配角连获殊荣,足显功力非凡,令戏剧圈内人刮目相看。

2002年,这是肖秀莲就任剧团团长的第二年,时逢河南省第九届戏剧大赛,秀莲真诚地找到我,谈了她要打造戏曲精品的想法。于是我根据她的表演特点,为她量身定做了一部名叫《都市彩虹》的现代都市剧。由于肖秀莲的出色表演,该剧在河南省第九届戏剧大赛中获得演出金牌及省“五个一工程优秀剧目奖”,秀莲获得表演一等奖。

2003年4月,肖秀莲率团进京,在长安大剧院演出了《都市彩虹》,得到首都观众与学者专家一致好评。一出戏屡获殊荣,引起了省戏曲界专家对都市戏曲的兴趣,文化厅领导建议我再为肖秀莲量身定做两部都市剧,于是,《都市霓虹》、《都市长虹》分别在2005年、2008年立上舞台。

《都市霓虹》在河南省第十届戏剧大赛中,获得与《彩虹》同样多的掌声,并再次荣获演出与表演金奖以及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、省政府优秀艺术成果奖。而此时的秀莲,已将思绪延伸到了连我这个编剧也还毫无头绪的下一部戏之中了,她在当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:“当彩虹悬空的时候,我是洁白的‘兰花’;当霓虹闪烁的时候,我是朴实无华的‘芦花’,我还说不清在《长虹》中我将是什么花,但这朵花还肯定会是很美的。韩枫在下一部戏中,用心讴歌的还肯定定是真善美。是啊,不管世界怎么变,做好人的心态不能变。我信这个!”

2008年,肖秀莲的第三部都市剧《都市长虹》问世,正像她期待的那样,

我把一个同样朴实但生命力更强的名字“柳花”赋予了她。《都市长虹》参加河南省第十一届戏剧大赛荣获演出与表演金奖之后,2009年9月中旬,肖秀莲又一次率团进京,参加“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优秀剧目北京展演月”活动,

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国家领导人和首都观众演出《都市长虹》,座无虚席,好评如潮。

肖秀莲在短短的七年中,连续主演三部都市剧,均被河南内戏剧界专家誉为精品,不仅在国内创造了奇迹,在全国戏曲界亦绝无仅有。

2011年,红色革命现代豫剧《山城

母亲》成功搬上舞台。肖秀莲和她的团队在排练这个戏时正值三暑天,每一次排练,汗水都要湿透一身衣服,在做武打动作时肖秀莲不慎扭伤了腰,她在打着钢板的情况下坚持排练。任何事都要有付出才会有回报,俗话说,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就是这个道理。《山城母亲》在第十二届河南省戏剧大赛上荣获剧目和表演金奖。2012年9月,肖秀莲再次率团进京,代表河南省在首都长安大剧院展演,向党的十八大献礼。同月,《山城母亲》荣获“河南省第五届黄河戏剧奖金奖”和“个人表演一等奖”。2013年11月,《山城母亲》代表河南省唯一剧目参加中国第十三届戏剧节,并荣获全国专业戏剧最高奖“中国戏剧奖·优秀剧目奖”,肖秀莲荣获“优秀表演奖”。2014年5月,《山城母亲》参加第九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优秀剧目调演,荣获“第九届全国戏剧文化奖·原创剧目大奖”,肖秀莲荣获个人“表演大奖”。著名戏剧理论家、中国戏剧家协会《剧本》月刊原主编温大勇看完豫剧《山城母亲》后,对肖秀莲的精彩表演赞不绝口:

母亲》成功搬上舞台。肖秀莲和她的团队在排练这个戏时正值三暑天,每一次排练,汗水都要湿透一身衣服,在做武打动作时肖秀莲不慎扭伤了腰,她在打着钢板的情况下坚持排练。任何事都要有付出才会有回报,俗话说,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就是这个道理。《山城母亲》在第十二届河南省戏剧大赛上荣获剧目和表演金奖。2012年9月,肖秀莲再次率团进京,代表河南省在首都长安大剧院展演,向党的十八大献礼。同月,《山城母亲》荣获“河南省第五届黄河戏剧奖金奖”和“个人表演一等奖”。2013年11月,《山城母亲》代表河南省唯一剧目参加中国第十三届戏剧节,并荣获全国专业戏剧最高奖“中国戏剧奖·优秀剧目奖”,肖秀莲荣获“优秀表演奖”。2014年5月,《山城母亲》参加第九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优秀剧目调演,荣获“第九届全国戏剧文化奖·原创剧目大奖”,肖秀莲荣获个人“表演大奖”。著名戏剧理论家、中国戏剧家协会《剧本》月刊原主编温大勇看完豫剧《山城母亲》后,对肖秀莲的精彩表演赞不绝口:

沙河豫剧口口传,山城母亲唱新篇。肖旦撑旗马金凤,双枪劫狱肖秀莲。统军征战智勇备,喜歌能打武全功。都市三虹曾惊艳,豪情白噪新韵。

2014年7月,以三川交汇的豫东商业重镇周口为平台,勾画了上世

纪三十年代末一位普通女人大义灭亲、嫉恶如仇的故事,表现了豫东平原百姓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同心抗日、忠贞报国、爱憎分明、大义大爱的精神的《周口》三部曲之一豫剧《口上的女人》成功上演。9月,《口上的女人》荣获河南省第十三届戏剧大赛“金奖”,肖秀莲个人荣获“表演一等奖”,周口市戏剧艺术研究院也因此成为全省唯一的省戏剧大赛金奖“五连冠”。2015年1月,《口上的女人》荣获第六届黄河戏剧奖“金奖”。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,《口上的女人》被河南省选为优秀剧目,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展演。

作家姜玉海老师对肖秀莲的艺术人生是这样描写的:

梨园世家戏为魂,舞台纵横数十年。

酷暑严寒勤苦练,五功四法皆传神。

精益求精艺中花,馨芳远播满乾坤。

屡夺金奖戏中魁,献身舞台为人民。

是的,肖秀莲是一位用心爱戏、用心演戏的演员。她从坎坷的童年走向今天的坦途,源自她的心底有爱的支撑。

因为心中有爱,所以她成功了,观众会记住她,豫剧会记住她!

## 白危:《垦荒曲》倾情黄泛区

□ 翟国胜

著名作家白危的《垦荒曲》,写的是解放初期,一大批工人、干部在黄泛区荒凉寥廓的土地上开垦荒地、建设新型国有农场的故事。此书1963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第一次出版,次年7月再版,当时好评如潮,尤为黄泛区人所称道,成为一代又一代泛区人的传统读物。

白危(1911—1984年),原名吴钦宏,又名吴渤,广东省兴宁市宁中区人。幼年在家乡读私塾、当学徒,后入兴宁中学,因参加学潮被开除,往上海东亚文学院求学。“九·一”事变因参加罢课又遭开除。上世纪30年代,白危积极参加左翼新兴木刻运动,在鲁迅指导下,编译了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本讲述木刻的书《木刻创作法》,由鲁迅亲自校阅并写了序言。1937年秋,白危在谢觉哉直接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,主编《战斗》周刊。1938年5月,由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参观访问,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。他在延安逗留5个多月,写下了5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《延安印象记》。抗战期间应陶行之邀担任育才学校教导主任。

1950年,白危到豫东参加土地改革运动,在黄泛区看到很多当时堪称稀有的履带拖拉机,还看到大批的人员在黄泛区漫无边际的田野上忙碌,这引起了他的关注。后来,白危在黄泛区农场接

触到各式各样的人,看到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,在黄泛区的荒野里热火朝天地垦荒造田,他们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激发了白危的创作欲望。1954年,他响应党的号召,到黄泛区农场体验生活,并担任了副场长。虽然当时给他配备了吉普车,但他总喜欢到田间地头、到职工家中,搜索创作素材。在这里,他一待就是十年,终于写出了《垦荒曲》这部上下两册、共75章、约55万字的长篇小说。作品讴歌了白手起家、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,表现了国有农场的优越性和示范作用。同时,展示了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以及农场内外的种种矛盾冲突,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、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。其中,着力描写的机耕队长赵辛田,不畏艰险,为新中国的建设忘我奋斗,表现了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意志,为黄泛区农场留下了闪光的历史。即使到了今天,该作品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宝贵的史料价值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白危又重返黄泛区农场,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多,计划仍以黄泛区农场为背景,再创作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后国营农场发展变化的长篇小说。遗憾的是1984年10月,白危在浙江宁波地区访问途中,突发脑溢血逝世,最终没能实现他的愿望。

千千万万泛区人至今还在怀念着白危,温习着他的《垦荒曲》。

## 吃红薯的“艺术”

□ 张恩岭

“民以食为天”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七十年代,红薯就是豫东一带农民的“天”。

那个时候,小麦、豆类因农业技术落后和“人民公社”体制的原因,产量很低,每年除了交公粮,一个生产队就所剩无几了。而红薯产量较高,于是,“一年红薯半年粮”,红薯就成了一日三餐的“主食”(甚至在三年饥饿时期,红薯也是不能随便吃饱的)。“红薯汤、红薯馍,离开红薯不能活”就是当时流行的儿歌。但是,红薯又不能常吃,吃得多了有人肚子发胀,有人“肚疼”,怎么办?人们便在吃红薯的方法上动起了脑筋,变着花样吃,结果,就创造了吃红薯的“艺术”。

吃红薯的“艺术”大致有三种:简单吃法、复杂吃法、变相吃法。

简单吃法是最基本最原始的吃法。“清早蒸、上午煮、晚上喝的红薯茶”即属此法。清早蒸,无须多说,“晚上”也很简单,就是把红薯剁成块,放在锅里煮,连汤带薯灌进肚子了事。上午则繁琐一点,先把红薯用“拉子”(在一块白铁皮上冲上密密的眼子,用反面的毛茬搓拉)搓拉成豆大小的糁子,或掺点红薯叶子等野菜,捏成窝窝头,蒸熟了蘸着辣椒汁吃,还真的“津津有味”,改变了红薯的原始味道。

复杂吃法就费工得多,也不常吃。这种吃法是把蒸熟的红薯放凉,剥皮,放在瓷碗里,像捣米一样捣,直至捣成细腻的“面团”,没有了红薯那土气的外形。这种红薯“面团”可在鏊子上烙成饼子,或拍成糖糕样,挤成丸子,用油一炸,可就是精美的“点心”了。

变相吃法更高级一些,其实也只是叫红薯发生些“物理变化”而已。一种吃法是把红薯切晒成片,用水煮得稀烂,叫做“红薯片茶”,也可熬成“红薯粥”。事情就是这样的怪。在吃红薯的“艺术”十分精致的困难岁月里,反而吃不出“品位”,而今,吃出了品位,却失去了吃的艺术。

我们就是在“奇怪”的变化中,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前进的步伐。

非常  
岁月

## 《韭花帖》和《韭花帖》碑

□ 李乃庆

《韭花帖》是五代时期著名书法家杨